

汉藏语言复元音韵母的类型及来源*

燕海雄

[提要] 汉藏语言的复元音韵母以前高展唇元音和后高圆唇元音开头或结尾最为常见。从共时的角度看,复元音韵母在汉藏语言中分布极为广泛。从历时的角度看,复元音韵母是汉藏语言音节结构单音节化进程中的产物,其中,后响复元音韵母主要来自后置辅音的转化,前响复元音韵母主要来自韵母元音长短特征的转移,真性复元音韵母主要来自音节的合并。

[关键词] 汉藏语言 复元音韵母 类型 来源

一 前言

汉藏语言主要分布在中国或东亚大陆及其周边东南亚区域。这些语言在地理上毗邻,在类型上相似,有诸多共同的语言特征。有些特征可能是古代语言遗留的证据,有些特征可能是语言接触的产物。无论从共时的类型看,还是从历时的演变看,音节在众多共有特征中居于核心地位。汉藏语言的音节结构在共时类型上是复杂多样的,在历时演变上正在经历着共同的发展趋向,其中起到重要调整功能的至少包括以下3种趋势:其一是复辅音声母有简化的趋势;其二是辅音韵尾有简化的趋势;其三是逐渐产生声调的趋势(Li 1937, 1973; 马学良 1991:5-9)。这些共同的发展趋势影响并制约着汉藏语言音节结构的整体走向。

汉藏语言音系中存在着丰富的复元音韵母。关于复元音(韵母)的概念、性质以及分类问题,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罗常培、王均(1957:108-111),瞿霭堂(1991:25-47),林焘、王理嘉(1992:97-99),Ladefoged & Maddieson(1996),江荻(2002a:322-336),朱晓农(2010:261-266),田阡子(2009, 2015, 2016:11-40)等都有涉及。综合诸家关于复元音(韵母)的讨论,可以看出大多集中在音段层面,没有充分重视复元音韵母的产生与音节结构的演变之间的重要关系。本文在汉藏语音节结构演变的大背景下来探讨复元音韵母的共时类型与历时来源,认为复元音韵母是汉藏语言音节结构单音节化进程中的产物。

二 复元音韵母的共时类型

复元音(韵母)在世界语言音系中都有分布,但不平衡。Lindau et al.(1985)指出世界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境内汉藏语言的语音类型与音变共性研究(16BYY145)”成果之一。本文曾在“《民族语文》第十四届学术研讨会”(2021.7.17-18)上宣读。匿名审稿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和建议。谨此一并致谢。

上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语言存在二合复元音音段。在 451 种语言的 UPSID 音段数据库中，有 48 种语言存在二合复元音音段，仅占 10.64%。上述两项研究成果存在较大的出入，这与语言样本的选择可能有较大的关系，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与世界其他区域的语言比较，复元音韵母在汉藏语言中极为常见。

（一）汉藏语言复元音韵母的分布特色

汉藏语言音系数据库^①中共有 127 种语言样本，有且仅有 1 种语言（即彝语喜德话）没有复元音韵母，其余 126 种语言都有复元音韵母，例如，柔若语（藏缅语族）有 50 个复元音韵母，畲语（苗瑶语族）有 6 个复元音韵母、汉语潮州话有 47 个复元音韵母等。彝语除喜德话之外，其他方言音系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复元音韵母，如彝语东南部方言弥勒话有 1 个复元音韵母，即 uA；彝语西部方言南涧话有 2 个复元音韵母，分别为 ai 和 ao；彝语中部方言南华话有 5 个复元音韵母，分别为 iA、io、iq、iu、uA 等；彝语南部方言墨江话至少有 9 个复元音韵母，分别为 ie、iA、ib、io、iu、ue、ue、uA、ui 等，但都只出现在汉语借词中（《藏缅语语音和词汇》编写组编 1991:245-261）。这说明，复元音韵母在彝语各方言音系中的地位存在较大的差别。

复元音（韵母）在两个数据库中有显著性差异。UPSID 音段数据库中的 451 种语言样本共有 203 个复元音音段，平均每个语言不足 1 个。复元音韵母在汉藏语言音系的分布见表 1：

表 1 复元音韵母在汉藏语言音系中的分布

	藏缅语	苗瑶语	侗台语	汉语	合计
复元音韵母	746	324	633	543	2246
语言样本	46	26	35	20	127
平均值	16	16	18	27	17

汉藏语言音系数据库中的 127 个语言样本共有 2246 个复元音韵母，平均每个语言约有 17 个。从不同的语族看，藏缅语（16）和苗瑶语（16）低于平均值，侗台语（18）超过了平均值，而汉语（27）则远超平均值。UPSID 数据库中共有 48 个语言存在复元音音段，其中复元音音段超过 20 个的语言仅有 2 个，大部分语言有 1 至 4 个复元音音段，在存在复元音音段的语言样本中约占 72.92%。在汉藏语言音系数据库中，大部分语言有 8 至 24 个复元音韵母，在存在复元音韵母的语言样本中约占 57.48%。在 20 种汉语方言音系中，复元音韵母低于 20 个的方言样本仅有 2 个，即双峰话有 17 个、温州话有 19 个，其他 18 种方言中的复元音韵母都超过了 20 个。从这些现象可以看出，复元音韵母在世界语言音系中较为少见，而在汉藏语言中极为常见，在汉语方言音系中最为多见。

汉藏语言中的复元音韵母不仅数量丰富，而且类型多样。从复元音韵母的性质看，既有

^① 汉藏语言音系数据库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的语言》（孙宏开等 2007）中的音系材料；考虑到语言样本的多样性和平衡性，本文增补了 13 种侗台语言或方言和 19 种苗瑶语言或方言，材料来自《傣语方言研究》（周耀文、罗美珍 2001）、《壮语方言研究》（张钧如、梁敏等 1999）、《瑶族布努语方言研究》（蒙朝吉 2001）、《吉卫苗语研究》（向日征 1999）、《江华勉语研究》（郑宗泽 2011）以及《苗瑶语方言词汇集》（中央民族学院苗瑶语研究室 1987）；另，汉语方言音系数据均来自《汉语方音字汇》（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 2003），共 20 种汉语方言。本文音系材料为藏缅语言或方言 46 种、侗台语言或方言 36 种、苗瑶语言或方言 26 种以及汉语方言 20 种。

真性复元音韵母，又有假性复元音韵母。假性复元音韵母极为常见，而真性复元音韵母较为少见。在本文的数据库中，真性复元音韵母主要分布在藏语方言音系中。藏语拉萨话有2个真性复元音韵母，分别为iu和au；而藏语噶尔话共有16个真性复元音韵母，其中7个为非鼻化的真性复元音韵母，分别为ia、iu、ea、ao、au、oa、ua；9个为鼻化的真性复元音韵母，分别为iā、iō、eā、eō、ēī、aō、aū、oā、uā。藏语噶尔话中的真性复元音韵母还存在长短特征的对立，并与声调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可以处理为声调的附属现象（孙宏开等 2007:171）。

汉藏语言中的假性复元音韵母既有前响的，又有后响的。前响复合元音韵母主要以-i、-u充当韵尾，后响复元音韵母主要以i-、u-充当韵头。具体数据见表2：

表2 假性复元音韵母在汉藏语言音系数据库中的分布（比例：%）

韵母类型	藏缅语		苗瑶语		侗台语		汉语		合计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前响	154	21.04	129	39.81	285	45.02	98	18.05	666	29.84
后响	578	78.96	195	60.19	348	54.98	445	81.95	1566	70.16
	732	100	324	100	633	100	543	100	2232	100

通过表2数据可以看出，后响复元音韵母在汉藏语言音系中占有较大优势。这种优势在侗台语和苗瑶语中稍弱，约占60%左右；在藏缅语和汉语方言中却格外突出或显著，约占80%左右。假性复元音韵母在汉藏语言中的这种分布趋势（后响 > 前响）与复元音韵母的历时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汉藏语言中不仅存在着丰富的二合复元音韵母，还存在着丰富的三合复元音韵母。具体数据见表3：

表3 二合 / 三合复元音韵母在汉藏语言音系数据库中的分布（比例：%）

韵母类型	藏缅语		苗瑶语		侗台语		汉语		合计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二合	691	92.63	282	87.04	600	94.79	481	88.58	2054	91.45
三合	55	7.37	42	12.96	33	5.21	62	11.42	192	8.55
	746	100	324	100	633	100	543	100	2246	100

在2246个复元音韵母中，二合复元音韵母有2054个（约占91.45%），三合复元音韵母有192个（约占8.55%）。这种现象说明二合复元音韵母在汉藏语言音系中占据绝对优势，这种优势在侗台语和藏缅语中更为显著。

复元音韵母可能存在长短特征之间的对立，这种现象主要体现在侗台语中。如侗台语族壮傣语支的壮语武鸣话共有12个复元音韵母，其中韵核为短元音的复元音韵母有5个，分别为au、ai、ei、au、ou；韵核为长元音的复元音韵母有7个，分别为ai、oi、ui、ui、au、eu、iu。长短特征在侗台语中最为常见，在其他汉藏语言中也有体现，如藏缅语族的勒期语、苗瑶语族的布努语和勉语等。

复元音韵母还有可能存在松紧特征之间的对立，这种现象主要在藏缅语中有所体现。如藏缅语族景颇语支的景颇语共有8个复元音韵母，其中4个复元音韵母的韵核是松元音，分

别为 ai、oi、ui、au；4 个复元音韵母的韵核是紧元音，分别为 ai、oi、ui、au；从上述两组复元音韵母可以看出，景颇语中的松紧对应非常系统。除此之外，藏缅语族缅语支的载瓦语、浪速语、波拉语、勒期语和彝语支的末昂语、柔若语、怒苏语以及羌语支的木雅语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松紧特征之间的对立。

汉藏语言中的复元音韵母还可以附加不同性质的辅音韵尾。常见的辅音韵尾主要有鼻音韵尾 -m、-n、-ŋ 和塞音韵尾 -p、-t、-k、-ʔ。具体数据见表 4：

表 4 辅音/元音韵尾的复元音韵母在汉藏语言音系数据库中的分布（比例：%）

韵尾类型	藏缅语		苗瑶语		侗台语		汉语		合计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辅音韵尾	103	13.81	85	26.23	162	25.59	233	42.91	582	25.91
元音韵尾	643	86.19	239	73.77	471	74.41	310	57.09	1664	74.09
	746	100	324	100	633	100	543	100	2246	100

通过表 4 数据可以看出，不带辅音韵尾的复元音韵母在汉藏语言中占据绝对优势（约占 74.09%），而附带辅音韵尾的复元音韵母较为少见（约占 25.91%）。这种分布状况与汉藏语言辅音韵尾简化的整体发展趋势是一致的。从不同的语族看，附带辅音韵尾的复元音韵母在藏缅语（约占 13.81%）、侗台语（约占 25.59%）和苗瑶语（约占 26.23%）中的音系地位明显弱于元音韵尾，而在汉语方言（约占 42.91%）中却没有这种绝对性趋势。这就说明，复元音韵母中的辅音韵尾在汉语方言音系中脱落得较慢，保留得较多，尤其体现在汉语南方方言音系中。

不同辅音韵尾的复元音韵母在汉藏语言音系数据库中的分布具体见表 5：

表 5 不同辅音韵尾的复元音韵母在汉藏语言音系数据库中的分布

辅音韵尾	-m	-n	-ŋ	-p	-t	-k	-ʔ	合计
数量	31	124	195	29	61	65	77	582
合计	350			232				

从不同的辅音韵尾看，鼻音韵尾与复元音韵母的组合能力明显强于塞音韵尾。在鼻音韵尾内部，双唇鼻音韵尾与复元音韵母的组合能力最弱，其次是齿龈鼻音韵尾，软腭鼻音韵尾最强。在塞音韵尾内部，双唇塞音韵尾最弱，齿龈塞音韵尾、软腭塞音韵尾以及喉塞音韵尾之间没有体现出统计学意义上的趋势。这些数据与辅音韵尾在汉藏语言音系中的整体发展趋势是一致的。

综合上述讨论，复元音（韵母）在世界其他区域语言中较为少见，在汉藏语言中极为常见，在汉语方言音系中最为多见。汉藏语言中的复元音韵母不仅数量丰富，而且类型多样，在不同的语言中可能存在真性/假性、前响/后响、鼻化、长短、松紧等特征之间的对立。从共时的角度看，复元音韵母的分布极具“汉藏语特色”。

（二）复元音韵母的常见类型

复元音（韵母）在世界语言音系中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共性。Lindau et al.（1985）进一步指出，在存在二合复元音的语言中，又有 75% 的语言存在 ai，65% 的语言存在 au。常见二合

复元音（韵母）在 UPSID 音段数据库和汉藏语言音系数据库中的分布状况，见表 6：

表 6 常见二合复元音（韵母）在两个数据库中的分布（比例：%）

UPSID 音段数据库(451 种语言)			汉藏语言音系数据库(127 种语言)					
二合	语言数量	比例	二合	语言数量	比例	三合	语言数量	比例
ai	19	4.21	ai	85	66.93	iau	34	26.77
au	18	3.99	au	77	60.63	uai	29	22.83
ui	8	1.77	ui	79	62.20	uei	20	15.75
ei	7	1.55	iu	64	50.39	iəu	12	9.45
ɔi	6	1.33	ei	57	44.88	iou	9	7.09
ie	6	1.33	ua	54	42.52	iau	8	6.30
oi	6	1.33	ia	44	34.65	uai	7	5.51
ia	5	1.11	əu	44	34.65	iai	7	5.51
ou	5	1.11	ie	37	29.13	uəi	5	3.94

二合复元音（韵母）在两个数据库中都有分布。在 UPSID 音段数据库中，ai 和 au 最为多见，其中 19 个语言存在 ai，18 个语言存在 au。较之其他二合复元音韵母，ai 和 au 的出现频率极具优势。在汉藏语言音系数据库中，ai 和 au 也是最为多见的二合复元音韵母，二者的出现比例较之 UPSID 音段数据库更具优势。除了 ai 和 au 外，两个数据库还有其他交集，比如 ui、ei、ia、ie 等。三合复元音（韵母）在 UPSID 音段数据库中没有检索到，但在汉藏语言音系数据库中极为常见，其中最为常见的分别为 iau 和 uai。比较最为常见的二合和三合复元音韵母，二者之间存在关联，即最为常见的三合复元音韵母是在最为常见的二合复元音韵母的基础上附加韵头后形成的，即 ai 增加 -u- 韵头，而 au 增加 -i- 韵头，各自所加韵头与韵尾不同。上述现象说明复元音（韵母）在世界语言音系中的分布存在共性，同时也说明二合和三合复元音韵母在汉藏语言音系中的分布并不是孤立存在或者独自发展的，而是相互关联的。二合复元音韵母的韵头和韵尾分布情况，见表 7：

表 7 二合复元音韵母的韵头和韵尾（比例：%）

韵头/韵尾类型	i-	u-	-i	-u
数量	603	589	457	372
比例	29.36	28.68	22.25	18.11
合计	58.03		40.36	

最为常见的二合复元音韵母是以前高展唇元音和后高圆唇元音开头（即 i- 或 u-）或结尾（即 -i 或 -u）。在汉藏语言音系数据库中，二合复元音韵母共有 2054 个，其中以 i- 和 u- 作为韵头的复元音韵母共有 1192 个，约占所有二合复元音韵母的 58.03%；以 -i 和 -u 作为韵尾的复元音韵母共有 829 个，约占所有二合复元音韵母的 40.36%。上述数据表明，以前高展唇元音和后高圆唇元音开头或结尾的复元音韵母在汉藏语言音系中更具优势。三合复元音韵母的韵头和韵尾的分布情况，见表 8：

表 8 三合复元音韵母的韵头和韵尾（比例：%）

韵头/韵尾类型	i-	u-	-i	-u
数量	107	77	96	81
比例	55.73	40.10	50	43.08
合计	95.83		92.19	

在汉藏语言音系数据库中，三合元音韵母共有 192 个，其中以 i- 和 u- 作为韵头的三合复元音韵母共有 184 个，约占有三合复元音韵母的 95.83%；以 -i 和 -u 作为韵尾的三合复元音韵母共有 177 个，约占有三合复元音韵母的 92.19%。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以前高展唇元音和后高圆唇元音开头或结尾的三合复元音韵母在汉藏语言音系中占据绝对优势。

综合上述不同的数据，复元音韵母在世界语言音系中的分布很不平衡，其中在世界语言音系中较为少见，在汉藏语言音系中较为常见，在汉语方言音系中极为常见。在汉藏语言音系中，又以前高展唇元音和后高圆唇元音开头或结尾的复元音韵母最为常见。

三 复元音韵母的来源

汉藏语言的复元音韵母是一种后起的音系现象。就藏缅语而言，一般认为复元音韵母的来源可能与音节合并、复辅音声母的简化、辅音韵尾的简化、单元音韵母的裂化以及语言的接触等有关（《藏缅语语音和词汇》编写组 1991:70-84）。江荻（2002a:322-336）讨论了汉藏语言单元音复音化的演化原理，朱晓农（2004）讨论了汉语元音高顶出位的现象，田阡子（2009，2015，2016:41-104）讨论了汉藏语言复元音的类型和渊源。从历时的角度看，复元音韵母的来源与汉藏语言音节结构的简化密切相关。从整体上看，有些是跨音节的，如音节合并，有些是音节内部的，如音节简化。其中音节简化从逻辑上又有多种可能，比如复辅音声母的简化、辅音韵尾的简化以及单元音韵母的裂化等。江荻（2002:323）指出：复元音（韵母）的来源“往往都很零散，各个语言很不相同，难以形成规律性的或普适性的阐释”。在这些“零散”的语言现象中，音节合并和后置辅音转化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而辅音韵尾的转化和单元音韵母的裂化却表现得格外“零散”，不具有扩展性和解释性，还需进一步归纳和总结。

汉藏语言复元音韵母的类型是音节结构演变的结果。Li（1937，1973）、马学良（1991:5-9）等先后指出汉藏语言音节结构从古到今的简化趋势，即复辅音声母的简化、辅音韵尾的简化以及声调的产生。《藏缅语语音和词汇》编写组（1991:50-69、109-131）、孙宏开（1999，2001a，2001b）、马学良（1991:7-8）、燕海雄（2011:160-240）等进一步论证了复辅音的类型和简化的可能方式。复元音韵母的产生与汉藏语言音节结构的简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没有音节结构的简化就不会产生成系统的、泛区域的复元音韵母类型。汉藏语言音节结构的单音节化道路（尤其是汉语）不仅“走得早”，而且“走得远”，而其他系属的或区域的语言尚未真正走上或者刚刚走上单音节化的道路。这也许就是复元音韵母极具汉藏语特色的主要原因。

（一）后响复元音韵母的主要来源

后响复元音韵母的来源是多源的，其中后置辅音的转化是主要来源。后置辅音转化的更深一层的动力源自复辅音声母的简化，而复辅音声母简化的更深一层的动力源自音节结构的

单音节化。《藏缅语语音和词汇》编写组(1991:70-84)认为后响复元音韵母主要来源于后置辅音的转化和单元音的分化,田阡子(2009, 2015, 2016)也有相关论述。复辅音声母在汉藏语言中表现为多种类型,其中最为常见的有三种类型:[前置辅音+基本辅音]、[基本辅音+后置辅音]、[前置辅音+基本辅音+后置辅音]。其中第三种类型是第一种和第二种的组合。[前置辅音+基本辅音]在简化的过程中,其前置辅音倾向于擦音化并逐步脱落(燕海雄 2011:197-240);[基本辅音+后置辅音]在简化的过程中,其后置辅音倾向于逐步弱化为介音并进一步融入单元音韵母。试比较藏缅语的“蜜蜂”、侗台语的“额头”以及苗瑶语的“五”的语音形式:

“蜜蜂”:书面缅甸语 pja^3 ; 缅甸仰光话 pja^{55} ; 阿昌语 $tʃua^{31}ɕaŋ^{31}$; 仙岛语 $tʃo^{31}jaŋ^{31}$; 载瓦语 $pjo^{21}jaŋ^{21}$; 浪速语 $pjɔ^{35}jɔ^{31}$; 波拉语 pja^{31} ; 勒期语 $pji^{33}jaŋ^{33}$; 怒苏怒语 bia^{55} 。

“额头”:傣语版纳话 $na^{13}pha:k^{35}$; 临高语 $hau^{33}tui^{55}$; 壮语柳江话 $na^{54}pja:k^{33}$; 壮语武鸣话 $na^{55}pla:k^{35}$; 傣语德宏话 $ho^{35}la^{31}pha:k^{11}$; 壮语邕宁话 $na^{35}phlak^{53}$; 老挝语 $na^{31}pha:k^{31}$; 泰语 $pha:k^{11}$; 侗语 tja^{33} ; 拉珈语 $ɕeu^{52}pla:k^{24}$; 仡佬语 $ŋya^{132}pya$; 佯僂语 $ra^{33}pwa:k^{213}$; 水语 $ta^{35}pja:k^{55}$; 普标语 $ɬin^{53}sam^{53}daŋ^{53}$; 黎语通什话 $pla^{55}dau^{33}$; 黎语加茂话 $ku^{31}tu^{55}$ 。

“五”:苗语养蒿话 $tʃa^{33}$; 苗语吉卫话 $pʒa^{35}$; 苗语先进话 $tʃi^{53}$; 苗语石门坎话 puw^{55} ; 苗语青岩话 pe^{55} ; 苗语高坡话 $plɔ^{24}$; 苗语宗地话 pzi^{32} ; 苗语复员话 pja^{31} ; 苗语枫香话 $tʃa^{33}$ 。瑶语金秀话 pia^{33} ; 布努语大化话 pjo^{33} ; 巴哼语 $tʃa^{33}$; 炯奈语龙华话 pui^{44} ; 畲语陈湖话 pi^{22} ;

在藏缅语“蜜蜂”的语音形式中,书面缅甸语、缅甸仰光话、阿昌语、仙岛语、载瓦语以及勒期语的介音,从性质上看属于复辅音声母中的后置辅音,而在怒苏怒语中则变化为复元音韵母的韵头。侗台语“额头”词根的声母表现为多种语音形式,如 $ph-$ 、 $pj-$ 、 $pl-$ 、 $py-$ 以及 $pw-$,从中可以看出后置辅音有从擦音 $y-$ 变化为 $l-$ 、再变化为 $j-$ 或 $w-$ 的过程。在苗瑶语“五”的语音形式中,与侗台语类似,同样存在由后置辅音变化为介音的过程,并且有进一步变化为复元音韵母的趋向。从这些词可以看到,复辅音类型[基本辅音+后置辅音]在简化的过程中,后置辅音的语音特征可以通过弱化传递给介音,并进一步传递给韵母。由于后置辅音在音节结构中的过渡性征,由此产生的韵头也表现为过渡性征,从紧张度、响亮度和清晰度都表现为次要成分,形成了后响复元音韵母。至于韵头到底是 $-i-$ 还是 $-u-$,应当取决于后置辅音的调音部位。当后置辅音为唇音或舌背音时,倾向于生成 $-u-$;当后置辅音为舌面音时,则倾向于生成 $-i-$ 。尽管后响复元音的来源还有其他的可能,但在没有其他确凿的证据前,一般不应解释为单元音的裂化或者其他。另外,后置辅音并不是只能转化为后响复元音的韵头,在有的语言中还有其他可能,如有的可能与基本辅音一起塞擦音化,有的可能脱落等(燕海雄 2011:160-196)。

(二) 前响复元音韵母的主要来源

《藏缅语语音和词汇》编写组(1991:77-83)认为辅音韵尾的转化和单元音的分化可以产生前响复元音韵母,田阡子(2009, 2015:43-50, 2016)也有相关论述。从调音方法上看,常见的辅音韵尾有鼻音韵尾 $-m$ 、 $-n$ 、 $-ŋ$,塞音韵尾 $-p$ 、 $-t$ 、 $-g$ 、 $-ʔ$,以及 $-r$ 、 $-l$ 、 $-s$ 、 $-h$ 等;从调音部位上看,常见的辅音韵尾有唇音 $-p$ 、 $-m$ 、 $-f$,齿龈音 $-t$ 、 $-n$ 、 $-s$ 、 $-l$,软腭音 $-g$ 、 $-ŋ$ 、 $-x$,以及喉音 $-ʔ$ 、 $-h$ 等。汉藏语言的音节结构在演变的过程中,辅音韵尾倾向于脱落,其中塞音韵尾倾向于喉塞音化脱落,鼻音韵尾倾向于鼻音化脱落,而擦音类韵尾和边音韵尾倾向于直接脱落(燕海雄 2011:148-154)。

《藏缅语语音和词汇》编写组(1991:79-80)指出: 缅语支内部“部分收 η 、l、k 等韵尾的词, 在长期的语音演变过程中, 有向 i、u 韵尾转化的趋势”; 尔龚语中“带 u 韵尾的复元音大多来自收 -k 的韵尾, 也有少数来自 s、t 等韵尾的”; 格曼僜语中“收 -p 尾的可变读为 -u, 收 -k 尾的变读为 -u”等。现有研究表明辅音韵尾在简化的过程中可以形成复元音韵母, 但尚未找到较为严格的对应关系和可以系统解释的规律。这种零散现象的形成至少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 辅音韵尾的简化与复元音韵母的来源无关; 第二, 辅音韵尾的简化与复元音韵母的来源有关, 但不是充要条件, 而是可能条件。江荻(2002b)通过缅语中复元音韵母的音长数据论证了高元音韵母的复元音化的规律性, 认为长短特征可能是支配复元音化的条件, 并且进一步在亲属语言中得到了验证。鉴于辅音韵尾的脱落在更多的语言中并不会形成系统的复元音韵尾, 截至目前尚未找到真正的对应关系, 因此前响复元音韵母来自辅音韵尾的脱落还不能被认定为复元音化的动力。究其根本, 复元音韵尾的性质有可能取决于该语言的元音系统, 而非辅音韵尾系统。只有那些对韵母时长敏感的语言, 当辅音韵尾脱落之后, 单元音韵母即将获得长音特征并且具有了进一步复元音化的条件。而那些对韵母时长不太敏感的语言, 单元音韵母并不会因为辅音韵尾的脱落而获得时长上的补偿, 从而不具备复元音化的条件。因此, 韵母时长特征可能是复元音化的主要动力(江荻 2002b)。这项研究把辅音韵尾的简化和单元音韵母的复元音化有效地统一起来了。

(三) 真性复元音韵母的主要来源

音节的合并可能形成真性复元音韵母。现代藏语的三个方言中, 卫藏方言和康方言有复元音韵母, 安多方言没有复元音韵母; 其中真性复元音主要分布在大多数的卫藏方言和少数的康方言音系中(瞿霭堂 1991:25-26)。现代藏语方言音系中的真性复元音韵母主要是通过音节的合并形成的。以藏语卫藏方言拉萨话中的真性复元音韵母为例:

“牛犊”: 藏语拉萨话 phiu^{13} ; 书面藏语 befu ; 藏语巴塘话 $\text{pi}^{13}\text{lo}^{55}$; 藏语夏河话 witə ; 藏语阿力克话 wilə ; 错那门巴语 $\text{pre}^{55}\text{pe}^{53}$ 。

“猴子”: 藏语拉萨话 piu^{55} ; 书面藏语 sprefu ; 藏语巴塘话 $\text{tʂy}^{55}\text{ʔa}^{55}\text{ge}^{53}$; 藏语夏河话 xwi ; 藏语阿力克话 rpi ; 错那门巴语 pra^{53} ; 墨脱门巴语 zala 。

“马驹”: 藏语拉萨话 tiu^{55} ; 书面藏语 rtefu ; 藏语巴塘话 $\text{ty}^{55}\text{zu}^{53}$; 藏语夏河话 htiyo ; 藏语阿力克话 rtiyo ; 错那门巴语 $\text{tip}^{53}\text{ʂu}^{53}$; 墨脱门巴语 kurtadaza 。

从“牛犊”“猴子”“马驹”可以看出, 书面藏语中的双音节语音形式在藏语拉萨话中合并为复元音韵母了。这个复元音韵母是由第一个音节和第二个音节的单元音韵母组合而成。再以藏语康方言巴塘话中的复元音韵母为例:

“细”: 藏语巴塘话 tʂhau^{13} ; 书面藏语 phrabo ; 藏语拉萨话 $\text{pha}^{55}\text{po}^{55}$; 藏语夏河话 tʂhawo ; 藏语阿力克话 ntʂhawə ; 错那门巴语 $\text{phra}^{53}\text{mo}^{53}$; 墨脱门巴语 zemo 。

“肚脐”: 藏语巴塘话 tia^{55} ; 书面藏语 lteba ; 藏语拉萨话 te^{55} ; 藏语夏河话 hte ; 错那门巴语 $\text{pho}^{55}\text{ʂu}^{53}$; 墨脱门巴语 putima 。

“鼻涕”: 藏语巴塘话 ŋau^{53} ; 书面藏语 snabs ; 藏语拉萨话 $\text{nəp}^{55}\text{tu}^{52}$; 藏语夏河话 hnatə ; 藏语阿力克话 rnætə ; 错那门巴语 nep^{53} ; 墨脱门巴语 ŋinaŋ 。

从“细”“肚脐”“鼻涕”可以看出, 书面藏语中的双音节语音形式在藏语巴塘话中变化为复元音韵母。藏语拉萨话和巴塘话中的复元音韵母主要来自构词层面上的音节合并, 在其他藏缅语言音系中还有构形层面上的音节合并。《藏缅语语音和词汇》编写组(1991:84)

分别论证了土家语的将行体和羌语桃坪话的第三人称将来时的构形规则。

土家语将行体的构形规则，见表 9：

表 9 土家语将行体的构形

词义	动词原形	将行体	语法意义
穿	ta ³⁵	tai ³⁵	将穿
飞	za ⁵⁵	zai ⁵⁵	将飞
打	xa ³¹	xai ⁵⁵	将打

羌语桃坪话第三人称将来时的构形规则，见表 10：

表 10 羌语桃坪话第三人称将来时的构形

词义	动词原形	将行体	语法意义
说	ɬi ²⁴¹	ɬiu ²⁴¹	（他）将说
看	tsia ³³	tsiau ⁵¹	（他）将看
买	po ⁵⁵	pou ⁵¹	（他）将买

音节的合并是真性复元音韵母的主要来源。汉藏语言中的音节合并会有多种可能性，其中最为常见的音变结果为闭音节韵母，而真性复元音韵母只是其中的一个较少的选项。但从音节演变的角度看，这种现象极具类型学价值。

四 结 语

复元音（韵母）在世界语言音系中较为少见，在汉藏语言音系中较为常见，在汉语方言音系中极为常见。这种分布特征与音节结构的历时演变及其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共时的角度看，复元音韵母的分布极具汉藏语特色。从历时的角度看，复元音韵母是汉藏语言音节结构单音节化进程中的产物。从来源上看，后响复元音韵母主要来自后置辅音的转化，前响复元音韵母主要来自韵母长短特征的转移，真性复元音韵母主要来自音节的合并。单元音韵母的复元音化在汉藏语言音节结构演变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音系调整功能。与复辅音声母的简化、辅音韵尾的简化以及声调的产生一起，单元音韵母的复元音化可以看作是汉藏语音节结构演变的另一种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 [1]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 2003.《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重排本），北京：语文出版社.
- [2] 江 荻. 2002a.《汉藏语言演化的历史音变模型》，北京：民族出版社.
- [3] 江 荻. 2002b.《缅甸语复合元音的来源》，《民族语文》第 3 期.
- [4] 梁 敏、张均如. 1996.《侗台语族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5] 林 焘、王理嘉. 1992.《语音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6] 罗常培、王 均. 1957.《普通语音学纲要》，北京：科学出版社.

- [7] 马学良主编. 1991. 《汉藏语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8] 蒙朝吉. 2001. 《瑶族布努语方言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9] 瞿霭堂. 1991. 《藏语韵母研究》，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
- [10] 孙宏开. 1999. 《原始汉藏语的复辅音问题——关于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构拟的理论思考之一》，《民族语文》第 6 期。
- [11] 孙宏开. 2001a. 《原始汉藏语辅音系统中的一些问题——关于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构拟的理论思考之二》，《民族语文》年第 1 期。
- [12] 孙宏开. 2001b. 《原始汉藏语中的介音问题——关于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构拟的理论思考之三》，《民族语文》第 6 期。
- [13] 孙宏开、胡增益、黄行主编. 2007. 《中国的语言》，北京：商务印书馆。
- [14] 田阡子. 2009. 《东亚语言复合元音的类型及渊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
- [15] 田阡子. 2015. 《复合元音在汉藏语中的语言类型》，《汉藏语学报》第 11 期第 43-50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 [16] 田阡子. 2016. 《汉藏语复合元音的类型及渊源》，北京：科学出版社。
- [17] 王辅世、毛宗武. 1995. 《苗瑶语古音构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8] 向日征. 1999. 《吉卫苗语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 [19] 燕海雄. 2011. 《论东亚语言塞音的音变规则》，上海：中西书局。
- [20] 《藏缅语语音和词汇》编写组. 1991. 《藏缅语语音和词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1] 张钧如、梁敏、欧阳觉亚等. 1999. 《壮语方言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 [22] 郑宗泽. 2011. 《江华勉语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23] 中央民族学院苗瑶语研究室. 1987. 《苗瑶语方言词汇集》，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 [24] 周耀文、罗美珍. 2001. 《傣语方言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25] 朱晓农. 2004. 《汉语元音的高顶出位》，《中国语文》第 5 期。
- [26] 朱晓农. 2010. 《语音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 [27] Ladefoged, Peter & Ian Maddieson. 1996. *The Sounds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Blackwel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8] Li, Fang-Kuei. 1937. Languages and dialects. In Shih Ch'ao-ying & Chang Ch'i-hsien (eds.), *The Chinese year book 1936-1937*, pp: 121-128.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 [29] Li, Fang-Kuei. 1973. Languages and dialects of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1): 1-13.
- [30] Lindau, Mona, Kjell Norlin & Jan-Olof Svantesson. 1985. *Cross-linguistic Differences in Diphthongs*. UCLA Working Papers in Phonetics 61: 40-44.
- [31] Maddieson, Ian. 1984. *Patterns of Soun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ypes and Origins of Compound Vowel Finals in Sino-Tibetan Languages

YAN Haixiong

[Abstract] Compound vowel finals with pre- or post- close front unrounded vowels and close back rounded vowels are the most common in Sino-Tibetan languages. From a synchronic perspective,

compound vowel finals enjoy an extremely extensive distribution in Sino-Tibetan languages. From a diachronic point of view, compound vowel finals are products in the course of monosyllabicization of Sino-Tibetan syllable structures; specifically, those with post-sonorous vowels mainly come from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st-initial consonants, those with pre-sonorous vowels mainly come from the feature shift of vowel length distinction of the finals, while those with equal sonorous vowels mainly come from the merging of syllables.

[Keywords] Sino-Tibetan languages compound vowel final type origin

(通信地址: 100872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本文责编 普忠良】

中国民族语言学会民族语文应用专业委员会第三次学术研讨会暨 中国民族语文应用第二届高端论坛召开

中国民族语言学会民族语文应用专业委员会第三次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民族语文应用第二届高端论坛于 2022 年 4 月 9 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召开。会议由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主办,中国民族语言学会民族语文应用专业委员会、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语文应用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承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语言应用研究室和《民族语文》编辑部协办。

教育部、国家民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单位的近 50 位知名专家学者与会。

会议围绕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和《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以新时代民族地区语言文字工作新使命为主题,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就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语言生活和语言服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以及基于语言文字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单位的相关领导出席会议并在开幕式上致辞。

中央民族大学 李 梦